

.....
ZHONGDIANXUEKEXILIE · ZHONGDIANXUEKEXILIE

传统中国的 社会文化研究

钱 杭◎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ZHONGDIANXUEKEXILIE · ZHONGDIANXUEKEXILIE

传统中国的 社会文化研究

钱 杭◎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研究/钱杭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80745 - 241 - 6

I. 传… II. 钱… III. 文化史—中国—文集 IV. K2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3815 号

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研究

主 编: 钱 杭

责任编辑: 言 孙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1.75

插 页: 2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45 - 241 - 6/K · 044

定价: 4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王 崇 基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 1958 年。半个世纪以来,全院科研人员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为使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们审时度势,明确定位,提出把上海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目标,以此为导向,切实推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建设,使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和科研水平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

社科院 50 年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专业研究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伊始就以扎实深入的学术研究为各项工作的重心。我院的科研人员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积极投入对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1959 年 4 月,经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倡议,在上海召开了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为主题的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为此,经济所成立了三个调查组,兵分三路同时开展社会调查,写出了 11 万字的 6 个调查报告。这些研究成果密切联系社会实际,记载了有关价值规律作用的许多生动资料,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61 年,姚耐、雍文远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出版,它是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前公开出版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发行量达 20 多万册。

在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我院的科研人员也做了大量工作。1958 年 9 月,由经济研究所科研人员编撰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 10 月,《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新闻日报》及国外学术刊物对此作出了积极的评价。1958 年以后,历史研究所的科研成果《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行为罪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戊戌变法史论

从》等相继问世。这些珍贵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为60年代初期全国史学界共同促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重建。广大科研人员焕发出极大的科研热情,他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牢牢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紧紧围绕改革开放的主题,全力服务于全国和上海的发展,在基础理论和现实应用两大领域着力突破,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都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成果。

学科是孕育学术杰出人才的摇篮。这里仅以经济学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两个学科的发展为例加以说明: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1980年,陈敏之提出住宅是商品的观点,为后来房地产市场的兴起和福利分房制度的改革作了最初的理论准备。1985年,雍文远主持的国家课题“社会必要产品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体系创新和理论深化。这两项成果都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此外,部门经济研究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198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建立和开发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建议》。1983年,部门经济研究所承担的国家课题“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得出重要的研究结论:(1)上海城市经济必须从以工业为主的单功能向多功能方向转变;(2)上海工业发展必须由拼设备向依靠高技术进步的方向转变;(3)在产业结构方面,必须从优先发展工业向优先发展第三产业转变。90年代初,姚锡棠等参与开发浦东研究的学者提出:浦东应建设成为既有金融贸易中心,又有先进制造业的多功能的综合经济中心;在尽量发挥外滩作用的同时,要下决心把中央商务区特别是金融中心放在浦东的陆家嘴;浦东开发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带动长江流域特别是长三角的发展。而18年来浦东和长三角的发展,正是印证了姚锡棠等人的战略判断。在这个基础之上,浦东新区也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结成了战略合作关系,正在共同推进关于浦东改革“先行先试”的战略研究。

1991年11月,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正式成立。1993年2月,院党委决定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这是全国第一个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马上参与筹备中宣部1993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1994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在中央党校、国家教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国防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组建的5个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地,要发挥骨干作用”,我院被列为全国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这一理论确立和命名为“邓小平理论”)五大基地之一。

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共同发挥基础理论与 应用研究在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中的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and 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这是对我院建设社会主义新智库的根本要求,也是我院学科建设应当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

为了更好地发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整体优势,努力拓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广阔领域,既重视和加强原有基础理论研究,又鼓励和扶植新的学科增长点,我院于2002年正式确定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经济刑法、上海城市史研究、思想文化、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等8个重点学科,集中一定的资源推动这些学科的建设。2006年,我院的重点学科增加到12个,除原有的8个以外,还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城市文化、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和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研究。同时,批准了14个特色学科,分别是: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文化创意产业,家庭学,租界、租借地等特殊地区研究,犹太学研究,上海合作组织研究,西方文学文化批评思潮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经济伦理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国学术思潮史,科学哲学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城市化研究。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的设置,体现了我院在学科定位、科研理念、科研体制和科研方法上的创新和探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正在发生的转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要求。

近几年来,我院学科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绩。一方面为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重要观点、思想和方法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咨询和服务,许多好的政策建议都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和新智库建设正在形成新的良性互动关系。

其实,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既离不开扎实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也离不开应用对策的系统研究。我院学科建设和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新智库的重要基础。没有学科建设和创新,就不会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创新,新智库建设也就不会有活水之源。事实已经证明,大量的有针对性的对策研究和应用研究一定是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否则就不会有科学性,不会有说服力。因此,在推进新智库建设中,我们必须要以学科建设为重要抓手,通过促进学科发展,为智库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人才服

务,为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智力支持和知识服务。当前,我院学科建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发展形势,我们应当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适应党和政府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努力从如下几方面着手,加大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力度。

一是以促进学科建设夯实研究基础,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基础和科研学术能力是我们的立院之本,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智库的根本所在。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鼓励研究人员以学科发展为载体,扎扎实实做好基础理论的研究,推动基础理论创新。

二是以促进学科建设提升决策咨询研究和智库服务的能力与水平。学科建设是提升决策咨询研究能力和水平的基础。我们鼓励科研人员在开展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申请和承担决策咨询研究课题,以学科发展带动决策咨询研究。

三是以促进学科建设培养和开发智库型人才。科研人才是我们的建院之本,智库型人才则是我们建设智库能力之本。我们通过学科建设带动学术团队成长,一方面注重发挥研究者的个体主动性、创造性,同时更注重推动不同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团队研究。我们要充分利用社科院多学科的优势,积极开展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交叉融合,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集中反映了我院重点学科、特色学科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功力扎实的理论分析,也有思想敏锐的真知灼见;有基础雄厚的体系构建,也有匠心独具的新颖见解;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对现实问题的追踪。通过这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成果的展示,我们可以感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不断求索的敬业精神,同时也印证了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特别是上海的发展和繁荣。我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我院的学科建设一定会为新智库的发展做出更好更多的贡献。

2008年6月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序言 “传统中国研究”的展开 途径：社会、历史、文献

由于“传统中国”内涵之博大精深,对“传统中国”的研究,因而也就必然表现为一个多角度、多方位的展开过程。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曾经对自己的宗旨有过这样的概括:我们力图使“传统中国研究”展现出一个开放的结构,大凡发生在1911年以前,有文献或实物依据,能够反映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在某一时段、某一侧面的实际存在状况,都可包括在这个结构之内。当然,这些只是我们心向往之的努力目标。受传统中国研究中心各成员研究领域的限制,目前的状态只能是从象征世界、生活形态、文献编撰、外部环境等四个方面,对传统中国进行范围有限的解读和分析。与既定的目标相比,这一现状以及取得的成果自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如果更换一个思考方向,将其视为推动今后继续前进的基础动力,则又不能不使人欣喜。读者完全有机会发现,由本书以下四章构成的这个平台,已经显示出足够的凝聚力、吸引力,显示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沉稳和坚实;更重要的是,作为上海社科院确立的一个重点学科,多角度、多方位展开的“传统中国研究”本身,在方法论上也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传统中国是一纵横整体的概念。纵者,上古三代至明清之谓。横者,政治、学术、经济、制度、思想风俗,以及宗教、教育、军事等综合连接的大文化系统之谓。纵横统一为一整体。传统中国这一概念,不采取类似“封建”“专制”的定性词,是一拒绝四边见障之本色指标,通俗的叫法,就是“过去中国”。若就历史文献学意义而言,即是“二十四史”之中国;就学科分类而言,大体上即是中国古代史和1911年以前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所过者化,所存者神。”^①传统中国之所以成为一整体,其中必有一个东西,足以化成这块土地族群人文,又纵横贯通于传统中国而存在。它使横者各项联结交

^① 《孟子·尽心上》。

融、贯通而有统一性。即使是中途参加的佛教亦因其不喧宾夺主而“朝着中国式的方向发展”(池田大作语),亦相容相处相通相融,而消化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纵者亦以此世代相传而有其统。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虽然亦讲正朔、定制度、易服色,但实际上都只是政权更迭的意义,在文化传统上从来不是另起炉灶、倒转乾坤与尽毁故垒。即使是周边非汉族而入主中原的元魏、蒙元、满清,也是奉行中原正朔,实施汉化方向,而共融共造华夏,不废孔孟主脉,不断中国文化之统。因此历朝相连,代代相传,血肉连焉。

这个使“所过者”之纵横化成一体、贯通二十四史而不随迹而去的“所存者”,“上下与天地同流”,超越历史时空又存在于历史时空,一定是既寄存于器又超越器的“道”,一定是历史精神、文化精神。其精神的内容一定是文化理想、文化观念、文化意识、历史意识,而以价值意识为核心、为本原。其表现出来的具体性质亦一定是民族的、社会的、实践的、生活的,具有方向性的。就其在历史文化长时间中传统而有统绪而言,可总称之为“中国传统”。中国传统“人文化成”了传统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存在性。

身处现当代的学人将如何真实地认识传统中国?通过历史文献的了解,仍是最基本的途径。然则如何保证文献途径的有效性?传统中国之概念,也是对20世纪百年史学反思的一个结果。清末民初,科举、读经相继取消,学术走向现代,走向西方,先有格义史学之开端,继而服从政治意识形态之工具史学长领时代之风骚。然而新事物不是样样都好,进口的又怎么可能全都合适?将“封建”作为全称冠名于秦汉以后之中国并加以价值化,即是工具史学的典型成果。

“反省”百年史学,是讨论“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旨趣时大家公认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里所说的反省或反思,不是笼统的批评和简单的否定,百年来的史学在断代专门的各个方面都有或大或小不可抹杀的成绩,这点毋庸置疑;我们有所质辩,只是因为百年史学有如国运,多经曲折,实际的成绩可谓未尽人意。最近有学者专论近代知识人文化自信心的丧失,其中说到“百年来中国学术的葛藤”,认为“一是视世界历史的发展为一元,二是以近世西方的价值为准绳”^①,确是的论。钱穆先生曾对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尽弃自家藏深为感慨:“把我们中国旧的以往历史一刀横切,腰斩了,下面一切从头做起,其实是从头模仿人家。这总是在我们历史文化的生命上一个莫大的病痛。我们本是一个五千年历史文化绵长的大国,现在则是一

① 严寿澂:《近世中国学术通变论丛》,台北编译馆2003年版,第11页。

个不到百年的新国。”^①钱先生所说也是所有真正心存“祖国”两字的人的“病痛”。

不必否认，不同文明有其相似之处，但终究说来还是所同不胜其所异。所以我们特以“传统中国”为名，是为了表示西潮袭来前的中国，是与西方经验不同的历史文化形态，而非以西方尺度可以衡量的低级“历史阶段”。这里所谓“非”，既是指西方一隅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乃至徐疾非如自然界有“规律”可循，用“科学”方法可以实测。工业革命后，科学的力量无远弗届，使人产生一种无所不能的自大幻觉，以为理性可以发现人类社会“来龙”的铁则，也可以“计划”人类社会“去脉”的走向。这类学说、思潮对中国百年史学，特别是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史学曾发生绝大的影响，不仅中国历史是西方前近代历史阶段已成定论，而且一时间上穷碧落，下索黄泉，探索中国的“奴隶制时代”、封建专制、科学精神、启蒙思想、唯物主义、市民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等等风靡一时，其中的具体研究固非全无可称，但总体上终不脱穿凿比附之嫌。近20年这一学说已然退潮，但流风余韵仍在。

人类社会并不按照无可抗拒的“规律”运行，这一点已为20世纪、尤其是晚近历史所证明；“规律”说本身在理论上的困难也早已为研究者指出。余英时先生充分肯定规律说“强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是一个深刻的观察”，但同时指出：

根据现代哲学家的分析，生产方式和所谓“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仍然有欠明确，远不能与科学上严格意义的规律相提并论。如果每一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如哲学、艺术、宗教等是被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么一种生产方式最多只能决定一种哲学、一种艺术、一种宗教。然而事实上每一时代都有多种哲学、艺术、宗教。究竟其中某一种哲学、艺术、宗教才算是典型的呢？其余非典型的又是被什么物质基础决定的呢？所谓“决定”，作为函数关系来说，又有什么确切的意义呢？

像这些问题，正如余先生所说“并没有得到基本的澄清”^②。也许有人会以为多样的“上层建筑”是因为每一时代的“生产方式”并不单一，只要寻绎出对应的联系，自可见潜移默化行的“规律”。这种想法的一厢情愿，不在于技术上的难度。技术上纵然复杂，借助种种“科学”手段终可解决或趋向解决。这种想法的问题是将“人

①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25页。

② 《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传统与史学》，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9—10页。

事”混同于“自然”。所谓“行有未至，可加功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这种想法即在于“路头”之“差”，“愈骛”反而“愈远”。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绝非如物质世界的演化，比如化学反应，可以呼卢成卢，喝雉成雉。

如果从事实出发，而不是观念先行，“传统中国”不是西方“黑暗的中世纪”（已有研究表明以往对中世纪也有妖魔化的一面）封建制，和再早的奴隶制的东方版可谓甚明。因此，对我们来说，“传统中国”，既是时空范围，更是含有价值认同的表述。这与狭隘、排外了不相干。对待西方学说——不论是主流还是近几十年大行其道的偏锋——的认识和态度，陈寅恪先生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名言深得我心，值得再次引用，以作为这篇短序的煞尾。寅老说：

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①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页。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序 言 “传统中国研究”的展开途径：社会、历史、文献 / 1

第一章 传统中国的象征世界 / 1

第一节 民间宗教 / 2

- 一 民间宗教的早期形式 / 2
- 二 弥勒信仰与摩尼教的关系 / 11

第二节 想像与信仰 / 30

- 一 美女与野兽 / 30
- 二 江南民间祠祀 / 39

第三节 佛教戒律与道教神灵 / 50

- 一 佛教戒律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 / 50
- 二 道教神灵系统 / 59

第二章 传统中国的生活形态 / 81

第一节 称谓与识字 / 83

- 一 商周称谓制度 / 83
- 二 秦汉的识字教材 / 100

第二节 饮食与用具 / 110

- 一 隋唐五代江淮地区的饮食风俗 / 111
- 二 敦煌文书什物历中的牙盘 / 126

第三节 家庭家族 / 135

- 一 洞庭席氏：同族、同乡与姻亲关系 / 135
- 二 徽州宗族：作为村规民约的族规家法 / 154

第三章 传统中国的文献编撰 / 168

第一节 史学 / 168

- 一 《通典》的编撰与版本 / 169
- 二 碑刻 / 187
- 三 日记 / 195
- 四 书札 / 212
- 五 地方文献 / 225

第二节 经学 / 241

- 一 简帛释读与传世文本修订 / 241
- 二 郑校《三礼》取舍异文的基本原则 / 247

第三节 思想精髓 / 260

- 一 司马迁：把过程归还历史书写 / 261
- 二 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 / 273

第四章 传统中国的外部环境 / 292

第一节 《穆天子传》所见东西交通路线 / 292

- 一 西征所示东西交通路线 / 293
- 二 往返所见部落或部族 / 295
- 三 西征历程 / 300

第二节 汉语外来词的词源 / 307

- 一 关于佛教汉语研究和词典编纂 / 307
- 二 古汉语外来词举例 / 311
- 三 汉语外来词的语源范围 / 316

第三节 明末以来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中国蓄妾恶俗 / 319

- 一 耶稣会士暧昧的反蓄妾宣传 / 319

二 新教传教士由力倡废妾而呼吁男女平等 / 324

三 废妾与男女平等争论的演变 / 328

主编后记 / 333

第一章 传统中国的 象征世界

社会史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定型以后,各社会成员就会因具体的利益关系而逐渐形成利害相关的社会集团、社会阶层,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社会成员间的共同利益,不仅表现为对某类物质性资源的共同占有和利用,还表现为拥有得到同类成员广泛认同的公意及公利意识。因此,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类集团,并不仅指同一利益人群的聚合形式本身,还包括将他们聚合为集团所必需的一系列“解释”、想像以及象征物。就历史的发展过程而言,“社会”的象征性结构与社会集团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只要此象征性结构存在,社会集团就存在;此结构一旦解体,社会集团亦无不解体之理。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发现这些“解释”本身也需要“解释”,就不会再迷信这些“解释”,以这些“解释”为内在支撑的集团就肯定面临解体,或者已经解体。在这个意义上,上述象征性结构就相当于“社会精神”。

正因为如此,“传统中国的象征世界”必然表现为一个高度综合的概念,绝不能归结为由某类社会成员独享、独占并独立代表。对属于该领域最核心部分的宗教、想像、信仰而言,所谓正统、主流、民间、支流等等定位语,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都是“传统中国的象征世界”的组成部分。由于观察习惯、资料保存等客观原因的存在,使得研究者向来持“自上而下”的立场,倾全力于正统、主流,而对民间、支流则较易忽略;而事实上,对于欲探索“传统中国的象征世界”的学者来说,民间宗教、文化想像、民间信仰的重要性,不但一点不低于其相对物,反而更应该受到重视。这不仅因为它提供了可与正统宗教、官方信仰相参照的另一套话语和象征体系,而且还因为它“自下而上”地描述了“传统中国的象征世界”的具体图像。在这个意义上,只有通过各类非正统非主流宗教、想像、信仰的了解,我们才能用一个既以实质性内容为基础、又超越实质而至“形上”层面的象征性结构,牢固地、全方位地支撑起“传统中国”的精神平台。

鉴于此,本章将首先关注民间宗教、文化想像与民间信仰,然后再从某些特殊角度切入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甚深甚广的佛、道两教。

第一节 民间宗教

在理解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的特质方面,植根于民间而不成系统的宗教形式,与在理论、设施、传教、神灵等领域已有高度成熟表现的宗教形式相比,往往显得更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若欲深刻呈现传统中国象征世界的逻辑结构,似应对保存在各类文献中的某些早期(甚至是偶一为之的)形式予以密切关注。同时,在早期形式与后期成熟形式之间的关系,亦为探索传统中国象征世界表达方式的演变历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 民间宗教的早期形式

在人类所有宗教仪式中,“祷告”都是最基本的行为;同时,亦随所祷内容、神灵种类、祷告主体、祷告方式的不同,名称也会不同,如颂祷、请祷、读祷、申祷、战祷、禳祷、精祷、祭祷、祈祷、祠祷、为马祷、为田祷、系玉祷、星下祷、聚巫祷、七夕祷、彭城祷、东溟祷、上下祷等类型。中国民间宗教原非一神教,祷告行为更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和多样性特点,先秦楚地盛行的“举祷”即为其中典型一例。

(一) 楚地卜筮中“举祷”实例

举祷为祭祷之一种,其性质是“杀性盛饌”,即给鬼神进贡肉食之饭。举祷之得名,是因为古代贵族生前的肉食之饌就叫做“举食”。古人“视死如生”,将其生前的“举食”之礼,移植到其死后的祭祀之中。“举祷”的内容,可与《国语·楚语》、《礼记·王制》等文献对应。

楚地卜筮祭祷简中,“举”字有时写作𧈧,有时写作𧈩,有时写作𧈪。主要见于如下几批简文:

1. 包山 M2 楚简^①

𧈩(舉)禱於宮地主一羖;……𧈩(舉)禱東陵連罍肥豕、酒食。……罷
禱於昭王特牛,饋之。……(简 202—203)

^①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以下引用包山简,俱出此书,不另具注。

𡗗(舉)禱独太一全泰;𡗗(舉)禱社全豬;……賽禱東陵連罌豕豕、酒食,蒿之。(简 210—211)

2. 望山 M1 楚简^①

𡗗(舉)禱東大王、聖[王]𠄎(简 10)

𡗗(舉)禱宮行一白犬、酒食(简 28)

3. 天星观 M1 楚简^②

有崇,敝之,𡗗(舉)禱……。^③

𡗗(舉)禱太一牲。

4. 秦家嘴 M99 楚简^④

𡗗(舉)禱大地主一豕,𡗗(舉)禱太……。。

5. 新蔡葛陵 M1001 楚简^⑤

𠄎祈福於北方,𡗗(舉)禱一佩璧𠄎(甲一 11)

𠄎於司命一鹿,𡗗(舉)禱於(甲一 15)

(二) 关于“举禱”的性质

关于“举禱”的性质,目前学术界的意见并不统一。包山楚简的整理者将“𡗗”、“𡗗”都读作“举”,并且引用《周礼·天官·膳夫》“王日一举”及其郑注,认为举禱就是“杀牲盛饌举行祭祀”^⑥。但也有不同意见,李零先生首先将之读作“與禱”,他说:

我们怀疑,“與禱”可能是始禱,与“賽禱”的“賽”是报答之义正好相反,两者有对应关系,而“翌禱”则是来年的禱。殷墟卜辞有周祭制度,简文所述或与之相似。^⑦

后来新蔡简公布时,整理者遇到“𡗗禱”的辞例时,均隶作“與禱”。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以下引用望山简,俱出此书,不另具注。

② 天星观简释文,引自晏昌贵:《天星观“卜筮祭禱”简释文辑校》,载丁四新主编:《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第二辑,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5—298 页。晏文均作“与禱”。以下本文所引天星观简,均出自晏文,不另具注。

③ 转引自于成龙:《包山二号楚墓卜筮简中若干问题的探讨》,《出土文献研究》第五辑,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5 页。

④ 晏昌贵:《秦家嘴“卜筮祭禱”简释文辑校》,《湖北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以下本文所引秦家嘴简,均出自晏文,不另具注。

⑤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 2003 年版。以下引用新蔡简,俱出此书,不另具注。

⑥ 《包山楚墓》,第 386 页注第 375。《包山二号楚墓卜筮和祭禱简的初步研究》,《包山楚简》附录二三,第 561 页。

⑦ 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6 页。